｢學校近視」的生命權力：近視的問題化(1960-1986)[[1]](#footnote-1)

本文借用生命權力的架構，通過歷史檔案的分析，追溯｢近視」成為公共健康問題的過程。不同於傳統醫學，本文發現當代臺灣的近視議題是在人口層次上立論，並發端自｢學校近視」。首先，｢學校近視」的議題由日治以來的身體檢查奠定基礎，並依附在更廣的教育議題如擴充教室、惡性補習之下。1980年代以前的知識生產常出現粗糙的因果論斷，並為政策實作層次的官員與後來的眼科研究者挑戰。其次，雖然學生視力保健在這樣的條件下興起，但後來的知識生產仍出現幾種新轉折：如尋求望遠凝視療法、擴充大型資料庫與進行心理學取向的行為研究等。在這一連串的爭議下，｢近視」才在1980年代由官方認定為公共健康問題，並通過生命權力的兩端，確立｢對凝視的凝視」：一方面，用眼習慣的矯正與演練形成規訓權力的一面；另一方面，聚焦在學生人口上的統計調查，則展現了生命政治的面向。

關鍵字：學校近視，生命權力，學生視力保健，對凝視的凝視。

1. 戴定皇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二年級（Email: r03325008@ntu.edu.tw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